

荀子集 韩非子集 贾谊集 扬雄集 司马相如集 建安七子集 曹操集 曹丕集 诸葛亮集 李贺集 唐代边塞诗集

朱熹集

韩愈集 柳永集 晏殊集 晏几道集 王安石集 岳飞集 辛弃疾集 陆游集 姜夔集 刘克庄集 元好问集 黄庭坚集 吴中四子集 归有光集 汤显祖集 方苞集 袁枚集 纪昀集 郑板桥集 杨州八怪集 龚自珍集

B244.71/028

1342406

中华文学百家经典

~~37484~~

朱

熹

集

B244. 71

028

重庆师大图书馆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与艺术学院
图书馆

时代文艺出版社



CS1518847

序言

中国文学从春秋中叶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呈现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这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随着百家争鸣而产生的诸子散文，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荀子》、《韩非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诸子散文显著提高了人们运用文字表述自身思想感情的能力，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生面。代表西汉前期文学主流的，是一批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政论散文。其文章的中心论题，是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为新王朝提供统治的良策。这些政论散文既继承了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又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整饬谨严风貌。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政论散文出自贾谊笔下。

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辞赋由于武帝的提倡流播全国，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并出现诸如司马相如、杨雄这样杰出的辞赋作家。他们创作的汉代大赋，以夸张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描写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繁荣富强、蓬勃向上，展示了令后人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

西汉末年经历了一个文学的低谷期后，到东汉中期则是汉代文学走出低谷、渐渐复苏、文学风尚发生转变的时期。东汉后期的文学则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并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

公元196年，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在建安时代前后，曹氏父子和他们周围的文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等“七子”的文学创作，被称为“建安文学”。在建安文学家的作品中，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功业的感情，都非常强烈浓重，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悲凉慷慨”的特点和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刘勰的《文心雕龙》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从魏晋到唐中叶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阶段。“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盛唐时期的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李贺的诗，多从个人命运出发，体验和反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表现了浓暗而艳丽，幽冷而华美的特殊意象。唐代边塞诗人则写下了大量边塞题材的诗作，其诗气势浑雄而飞跃自如，在驰骋纵横中以“风骨”取胜。

唐朝的“古文”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他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增添了许多新的合理的内容。作为中唐文坛诗坛的领袖，韩愈的诗以气势见长，想象丰富，感情充沛，风格独特，常能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他的散文则汪洋恣肆，瑰丽奇崛，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后人称之为“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

宋代的文化较前代更为普及，促进了文学的繁盛；而另一方面，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于文学的自由精神，又起着相当强大的约束作用。宋代文学普遍地显示出收敛的趋向，个性不那么突出，情感不那么直率热烈，气势也很少见恣肆纵放，政治和道德

成为文学中重要的主题，诗文与社会、政治或人生的实际问题紧密相关。王安石、朱熹的作品即为代表。

在诗歌创作方面，宋代的诗人常把自己的知识与学问贯串在诗中，刻意把诗写得精致深奥、含蓄深邃。因此，与唐诗相比，宋诗更费功力，更显精深，以瘦劲、深刻、曲折的风格著称。作为整个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陆游的诗以广泛的题材、多样化的风格和老练的技巧，取得了超越时代的成就。他的诗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反映着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人们的普遍心愿，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与此同时，“词”这种崭新的文学体裁到了宋代蔚为大观，成为了宋代文学的代表。北宋庆历以后，词的创作在内容、技巧、体制各方面都出现了飞跃的发展，同时也涌现出了晏殊、晏几道、柳永、姜夔、刘克庄这样一批卓有成就的作者。他们是宋词的正宗，擅写文人落拓、男女恋情、离愁别苦、自然山水之类传统题材，以清丽委婉、细腻精巧的艺术风格见长。此外，宋代还有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另一派词人，他们都是气概豪雄，借手中之笔抒发英雄壮志的人物，他们的词深沉豪迈，境界阔大，纵横千里，豪气干云。词在整个宋代就是循着这两家路数演进，前一路数维持着词的传统畛域而使它越发精致细腻，后一路数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

明代前期的文学大多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基础。明中期文学则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开始追求文学的独立性，要求文学表达自然之情。这一文学趋向在南方的主要代表是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他们的基本方向是反对理学，要求人性解放，重视文学的真情深感。此外，归有光虽不脱理学气味，但也主张描写“匹夫匹妇”的“至情至性”，他的散文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平易自然而又感

目 录

序言	(1)
自论为学工夫	(1)
论治道	(13)
论取士	(24)
论兵	(36)
论刑	(42)
论民	(44)
论财	(50)
论官	(54)
训门人一	(65)
训门人二	(79)
训门人三	(93)
训门人四	(108)
训门人五	(126)
训门人六	(151)
训门人七	(178)
训门人八	(192)
训门人九	(223)

自论为学工夫

某自卯读《四书》；甚辛苦。诸公今读时，又较易做工夫了。后生家好着些工夫，子细看文字。某向来看《大学》，犹病于未子细，如今愈看，方见得精切。因说：“前辈诸先生长者说话，于大体处固无可议；若看其他细碎处，大有工夫未到。”

某向卯角读《论》《孟》，自欲一本文字高似《论》《孟》者，竟无之。

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

某旧时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数卷，全不曾得子细；于义理之文亦然，极为病。今日看《中庸》，只看一段子。

读书须纯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搬涉，都不济事。某向时读书，方其读上句，则不知有下句；读上章，则不知有下章。读《中庸》，则只读《中庸》；读《论语》，则只读《论语》。一日只看一二章，将诸家说看合与不合。凡读书到冷淡无味处，尤当着力推考。

读书须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若读之数过，略晓其义即厌之，欲别求书看，则是于此一卷书犹未得趣也。盖人心之灵，天理所在，用之则愈明。只提醒精神，终日着意，看得多少文字！穷得多少义理！徒为懒倦，则精神自是愤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旧日读书，方其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方读《学而》第一，不知有《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来看去，直待无可看，方换一段看。如此看

久，自然洞贯，方为浹洽，时下虽是钝滞，便一件了得一件，将来却有尽理会得时。若撩东札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远，将来荒忙不济事。旧见李先生说：“理会文字，须令一件融释了后，方更理会一件。”“融释”二字下得极好，此亦伊川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后，自脱然有贯通处”。此亦是他真曾经历来，便说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释，而又欲理会一件，则第二件又不了。推之万事，事事不了，何益！

某是十六七时下工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恁地硬着力去做。至今日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吃了多少辛苦，读了书。今人卒乍便要读到某田地，也是难。要须积累著力，方可。某今老而将死，所望者，但愿朋友勉力学问而已！

器之问“野死有腐”。曰：“读书之法，须识得大义，得他滋味。没要紧处，纵理会得也无益。大凡读书，多在讽诵中见义理。况《诗》又全在讽诵之功，所谓‘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诗曲，若只读过，也无意思；须是歌起来，方见好处。”因说：“读书须是有自得处。到自得处，说与人也不得。某旧读‘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如此等处，直为之废卷慨想而不能已！觉得朋友间看文字，难得这般意思。某二十岁前后，已看得书大意如此，如今但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过了五十来年！”曰：“明窗静坐，只读《诗》。”某云：“谓器之看《诗》，病于草率。器之云：‘如今将先生数书循环看去。’”曰：“都读得了，方可循环再看。如今读一件书，须是真个理会得这一件了，方可读第二件；读这一段，须是理会得这一段了，方可读第二段。少间渐渐节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

间，可以读得经子诸书，迤迤去看史传，无不贯通。韩退之所谓‘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须有沉潜反复之功，方得。所谓‘审问之’，须是表里内外无一毫之不尽，方谓之审。凭地竭尽心力，犹有见未到处，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尽心力，只见得三两分了，便草草揭过，少间只是鶻突无理会，枉着日月，依旧似不曾读相似。只如韩退之、老苏作文章，本自没要紧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间方会渐渐埽去那许多鄙俗的言语，换了个心胸，说这许多言语出来。如今读书，须是加沉潜之功，将义理去浇灌胸腹，渐渐荡涤去那许多浅近鄙陋之见，方会见识高明。”因说：“读《诗》，惟是讽诵之功。上蔡亦云：‘《诗》，须是讴吟讽诵以得之。’某旧时读《诗》，也只先去看许多注解，少间却被惑乱。后来读至半了，都只将《诗》来讽诵至四五十过，已渐渐得《诗》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觉减了五分以上工夫；更从而讽诵四五十过，则胸中判然矣。”因说：“如今读书，多是不曾理会得一处通透了，少间却多牵引前面疑难来说，此最学者大病。譬如一个官司，本自是鶻突了，少间又取得许多鶻突底证见来证对：却成一场无理会去，又有取后面未曾理会底来说。却似如今只来建阳县，犹自未见得分晓，却又将建宁府与南剑州事来说，如何说得行！少间弄来弄去，只是胡说瞒人。有人说话如此者，某最怕之。说甲未了，又缠向乙上去；说乙未了，又缠向丙上去；无一句着实。正如斜风雨相似，只管吹将去，无一点着地。故有终日与他说，不曾判断得一件分晓，徒费气力耳。”

先生因与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

问：“近看胡氏《春秋》，初无定例，止说归忠孝处，便为经义，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尝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

‘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且不知让渠如此说，且存取大意，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看他，切不可忙；虚心观之，不须先自立见识，徐徐以俟之，莫立课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看时不同矣。大抵老兄好去难处用工，不肯向平易处用工，故见如此难进，令当于平易处用工。”

读书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会不得。若到闲时无书读时，得一件书看，更子细。某向为同安簿满，到泉州候批书，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册《孟子》，将来子细读，方寻得本意见。看他初间如此问。又如此答；待再问，又恁地答。其文虽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贯通；句句语意，都有下落。

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体究公事处，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论学一段分明。后官满，在郡中等批书，已遣行李，无文字看，于馆人处借得《孟子》一册熟读，方晓得“养气”一章语脉。当时亦不暇写出，只逐段以纸签签之云，此是如此说。签了，便看得分明。后来其间虽有修改，不过是转换处，大意不出当时所见。如谩人底议论，某少年亦会说，只是终不安，直到寻个恁实处方已。

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

问：“尝闻先生为学者言：‘读书，须得有个悦处，方进。’先生又自言：‘某虽如此，屡觉有所悦。’”因禀曰：“此先生进德日新工夫。不知学者如何到得悦处？”曰：“亦只是时习。时习故悦。”《晨》、《义》、《对答》、《重四重三酬呈《对答》《晨》、《重

某尝说，看文字须如法家深刻，方穷究得尽。某直是下得工夫。

某旧时读书，专要捡好处看，到平平泛泛处，多阔略，后多记不得，自觉也是一个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处，却全不识。

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如谢上蔡之说如彼，杨龟山之说如此，何者为得？何者为失？所以为得者是如何？所以为失者是如何？

某寻常看文字都曾疑来。如上蔡《观复堂记》、文定《答曾吉甫书》，皆曾把做孔、孟言语一般看。久之，方见其未是。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觉意思长进。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见，谓其不似，便不复看；不特不见其长处，亦不见其短处。

某寻常见是人文字，未尝敢轻易；亦恐有好处，鞭著工夫看它。

某所以读书自觉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论。

某自十五六时至二十岁，史书都不要看，但觉得闲是闲非没要紧，不难理会。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毕竟粗心了。吕伯恭教人看《左传》，不知何谓。

“学者难得，都不肯自去着力读书。某登科后要读书，被人横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读。”顾文蔚说：“且如公有谁鞭辟？毕竟是自要读书。”

看道理，若只恁地说过一遍便了，则都不济事。须是常常把来思量，始得。看过了后，无时无候，又把起来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时，又把起来看。恁地，将久自然解透彻。延平先生尝言：“道理须是日中理会，夜里却去静处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说去做，真个是不同。

或问：“先生谓：‘讲论固不可无，须是自去体认。’如何是体认？”曰：“体认是把那听得底自去心里重复思量过。伊川曰：

‘时复思绎，浹洽于中，则说矣。’某向来从师，一日间所闻说话，夜间如温书一般，字字子细思量过。才有疑，明日又问。”

问：“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曰：“此亦只是为公孙丑不识‘浩然之气’，故教之养气工夫缓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于无著摸处用工也。某旧日理会道理，亦有此病。后来李先生说，令去圣经中求义。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

器之问：“尝读《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觉心中有三病：笼统不专一，看义理每觉有一重似帘幕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论求此心放失，有千般万样病，何止于三？然亦别无道理医治，只在专一。果能专一，则静；静则明；明则自无遮蔽；既无遮蔽，须自有舒泰宽展处。这也未曾如此，且收敛此心专一，渐渐自会熟，熟了自有此意。看来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艺，也只要熟，熟则精，精则巧。”器之又问：“先生往时初学，亦觉心有不专一否？”曰：“某初为学，全无见成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讨。向时诸前辈每人各是一般说话。后来见李先生，李先生较说得有下落，说得较缜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见成下工夫处。看来须是先理会个安著处，譬如人治身，也须先理会个屋子，安著身己，方始如何经营，如何积累，渐渐须做成家计。若先未有安著身己处，虽然经营，毕竟不济事。为学者不先存此心，虽说要去理会，东东西西，都自无安著处。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说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敛得个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则如近日江西所说，则是守个死物事。故《大学》之书，须教人格物、致知，以至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节节有工夫。”

某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游玩意味，胸中自是洒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别处去，但一

割眼间便不见。才觉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难收拾。自去提撕，便见得是如此。”

近日已觉向来说话太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功夫，觉得闲中气象甚适。每劝学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其余文字，且大概讽诵涵咏，未须大段着力考索也。

旧在湖南理会《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践履，上是“知至”，下是“终之”，却不思今只理会个知，未审到何年月方理会“终之”也。是时觉得无安居处，常恁地忙。又理会动静，以为理是静，吾身上出来便是动，却不知未发念虑时静，应物时动；静而理感亦有动，动时理安亦有静。初寻得个动静意思，其乐甚乖，然却一日旧似一日。当时看明道《答横渠书》，自不入也。

旧来失了此物多时，今收来尚未便入腔窠，但当尽此生之力而后已。

今日学者不长进，只是“心不正焉”。尝记少年时在同安，夜闻钟鼓声，听其一声未绝，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惊惧，乃知为学须是专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晓。又从旁生一小念，渐渐放阔去，不可不察。”

这道理，须是见得是如此了，验之于物，又如此；验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见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见所言，又非自会说出来，亦是当初于圣贤与二程所说推之，而又验之于己，见得真实如此。

刘晏见钱流地上，想是他计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圣人说话，见圣人之心成片价从面前过。

某寻常莫说前辈，只是长上及朋友稍稍说道理底，某便不敢说他说得不是，且将他说去研究。及自家晓得，却见得他底不是。某寻常最居人后。又曰：“寻常某最得此力。”

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论篇》。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

或说：“象山说，‘克己复礼’，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圣贤，便不可。”曰：“此等议论，恰如小儿则剧一般，只管要高去，圣门何尝有这般说话！人要去学圣贤，此是好的念虑，有何不可？若以为不得，则尧舜之‘兢兢业业’，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颜子之‘有为若是’，孟子之‘愿学孔子’之念，皆当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禅。志公云：‘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岂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颜子：‘克己复礼为仁。’据他说话时，只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下头一落索？只是颜子才问仁，便与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说他，他又却讳。某常谓，人要学禅时，不如分明去学他禅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圣人之言夹杂了说，都不成个物事。道是龙，又无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静旧年也不如此，后来弄得直恁地差异！如今都教坏了后生，个个不肯去读书，一味颠蹇没理会处，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骂乱骂，教得个李斯出来！遂至焚书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见斯所为如此，必须自悔。使子静今犹在，见后生辈如此颠蹇，亦须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或问：“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

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问择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状》，言‘默坐澄心，观四者未发已前气象’，此语如何？”曰：“先生亦自说有病。”后复以问。先生云：“学者不须如此。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

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自此逐时去了。大凡人知个用心处，自无缘及得外事。

某自十四五岁时，便觉得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爱了。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

与范直阁说“忠恕”，是三十岁时书，大概也是。然说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较别。

三十年前进，三十年后长进得不多。

某今且劝诸公屏去外务，趺工夫专一去看这道理。某年二十余已做这工夫，将谓下梢理会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许多年纪，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会得这些子。岁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因言读书用功之难：“诸公觉得大故浅近，不曾著心。某旧时用心甚苦。思量这道理，如过危木桥子，相去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极苦。五十岁已后，觉得心力短，看见道理只争丝发之间，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学》、《中庸》、

《语》、《孟》诸文字，皆是五十岁已前做了。五十已后，长进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论说道理，只是前辈一样文士，亦是用几多功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里得来！如韩文公《答李翊》一书，与老苏《上欧阳公书》，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欧阳公则就作文上改换，只管揩磨，逐旋捱将去，久之，渐渐揩磨得光。老苏则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于书。看他们用工夫更难，可惜！若移之于此，大段可畏。看来前辈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钝底工夫，今人以至钝之才而欲为至敏底工夫，涉猎看过，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参也鲁。’须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读书须是虚心，方得。他圣人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顺他去。某向时也杜撰说得，终不济事。如今方见得分明，方见得圣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岁，方理会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则枉了。自今夏来，觉见得才是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凿。庄子云：“吾与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随他曲折恁地去。今且与公说个样子，久之自见。今人大抵偏塞满胸，有许多伎俩，如何便得他虚？亦大是难。分明道“知至而后意诚”，盖知未至，虽见人说，终是信不过。今说格物，且只得一件两件格将去，及久多后，自然贯通信得。

某觉得今年方无疑。理会得时，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几年！然十数年前理会不得，死又却可惜！

先生多有不可为之叹。汉卿曰：“前年侍坐，闻先生云：‘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兵随将转，将逐符行。’今乃谓不可为。”曰：“便是这符不在自家手里。”或谓汉卿多禅语。贺孙因云：“前承汉卿教训，似主静坐澄清之语。汉卿云，味道煞笃实云云。”先生曰：“静坐自是好。近得子约书云：‘须是识得喜怒哀乐未发之